

新一轮纳卡冲突：回顾与评估

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康杰

2020年9月27日，阿塞拜疆军队以“反击军事挑衅”为由，全线进攻亚美尼亚支持的纳戈尔诺-卡拉巴赫地区（Nagorno-Karabakh，下文简称“纳卡”）。开战近两周，双方交火已延伸至纳卡以外，除航空兵和地面部队外，均投入了弹道导弹和远程火箭炮等“准战略武器”，造成数千军民伤亡。10月9日，经俄出面调停，亚阿两国在莫斯科谈判后，同意自10日起停火。从交战规模与烈度而言，此次冲突均远超1994年停战以来的历次交火，甚至可称为“第二次纳卡战争”。

近年来，围绕纳卡地位和阿塞拜疆被占领土问题，亚阿两国间虽僵局难解、屡有摩擦，但总体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战略克制，坚持对话协商，聚焦国内改革和发展。亚美尼亚新政权大兴新政，提出以GDP增长15倍为目标的“2050愿景”，希吸引海外亚侨投资，发展高新产业与创新经济；阿塞拜疆积极挖掘里海区位潜力，大力推进产业多元化和区域互联互通。新冠疫情前，两国经济形势乐观，特别是亚经济增速冠绝欧亚地区。两国外长在今年1月、4月的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会谈中甚至声称要“共同准备和平”。在上述背景下，两国关系为何急转直下，爆发1994年后最大规模的冲突？

一、冲突升级的诱因

第一，从去年开始，亚美尼亚新政权在纳卡问题上转向强硬，削弱了双方的战略默契。

帕希尼扬政府执政初期，一度在纳卡问题上保持了低调、对话、和解的姿态。但2019年以来，亚美尼亚在纳卡问题上频频示强，帕希尼扬甚至在纳卡首府集会上公开声称“阿尔察赫共和国（Artsakh，纳卡在2017年修宪更名）就是亚美尼亚”，挑战了亚阿谈判的基础和1994年停战协议。

纳卡原为苏联时期阿塞拜疆治下的自治州，多数居民为亚美尼亚族，长期希望“回归”亚美尼亚。1991年，该州经全民公决建国，从阿分离。在亚军事与财政支持下，纳卡击败阿军，不仅控制了绝大部分原自治州领土，还占领了纳卡以外的大量阿领土（两者合计占阿版图近14%。2006年纳卡修宪吞并了后占的阿领土）。1994年，经俄罗斯斡旋，亚、阿和纳卡三方签署临时停火协议。但此后二十多年的和平谈判毫无进展，亚希望阿承认以纳卡作为谈判对象，以纳卡的民族自决为条件换取对方归还领土，阿则坚持纳卡是本国不可分割的领土。

因此，亚美尼亚虽对纳卡有事实控制权，但亚既不能承认纳卡独立，也未正式要求其并入本国；既要维护纳卡的主体地位，又必须模糊处理其主权地位。在法理上，亚官方虽称“作为阿塞拜疆一部分的纳卡没有未来”，但从未否认过纳卡现在不是阿的一部分。阿也正是因亚的上述立场，才同意与其谈判。二十多年来，亚对纳卡的模糊立场，是亚阿停火和谈判的共识基础。

帕希尼扬政府的上述表态，连同其将亚与纳卡共同置于国家发展规划中的做法，实际上是抛弃了维系亚阿两国脆弱和平的战略默契，削弱了阿

塞拜疆主和派地位。

第二，7月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阿塞拜疆政府的战略考量，使其抛弃了“搁置+和谈”的旧纳卡政策。

在阿利耶夫父子治下，阿塞拜疆凭借丰厚的能源收益和长袖善舞的平衡外交，大举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。过去10年中阿军费开支是亚的4倍，两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比与1994年不可同日而语。但阿顾虑国内外稳定，仍坚持以谈判促和解的政策。

7月12日至月底，亚阿两国在北部托乌兹（Tovuz）地区（位于纳卡以外）发生自2016年以来最大规模交火，双方阵亡数十人，包括阿第三军参谋长波拉德·哈希莫夫少将。此次交火具有偶然因素，也未进一步扩大，但对阿内政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阿国内爆发持续数日的大规模游行，纳卡带来的民族创伤感和疫情期间的压抑情绪叠加，使示威者将矛头对准现政权，指责政府内贪外弱。阿政局长期稳定，反对派不成气候，这种大规模示威极为罕见，使阿政府大为震惊。同时，随着阿推进一系列改革，围绕在第一夫人兼第一副总统阿利耶娃身边的年轻官僚，与前总统老阿利耶夫时代的“老近卫军”间的权力争夺激化，权力集团的团结和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。

在国内多重压力下，阿着手改变对纳卡问题的政策，抛弃了对和谈的希望。标志之一是7月16日，阿利耶夫斥责并撤换了在任16年之久的“主和派”外交部长马梅迪亚洛夫（Elmar Mamedyarov），改由教育部长贝拉莫夫（Jeyhun Bayramov）担任。因后者毫无外交经验，此举实际上等于阿本人直接操盘外交。总统办公厅下属国际关系分析中心主任沙菲耶夫（Farid Shafiyev）指出，阿政府和公众现在相信，“谈判是一条死胡同”。

第三，土耳其军事援助增强了阿塞拜疆动武的信心与能力。

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同属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，互称“一个民族，两个国家（Bir millet, iki devlet）”。加之土阿在能源领域互有需求，阿自独立以来便得到土各领域支持。在第一次纳卡战争期间，土以出兵干预相威胁，使亚美尼亚放弃进攻阿在亚土交界处的飞地纳希切万。2010年，土阿两国缔结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《战略伙伴关系与互助协定》（Stratejik Ortaklık ve Karşılıklı Yardım Anlaşması），规定“当其中一国遭遇第三国或国家集团入侵时，另一国应提供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支持”。尽管如此，7月冲突前，土阿军事合作仅限于军售、联合训练与演习等，没有直接介入军事准备。土突然加大对对纳卡的干预力度，疑似派出雇佣军和航空兵参战，其考虑有三：

一是对亚美尼亚进行预防性打击，防止其突袭土能源生命线。7月爆发冲突的塔乌兹地区不在纳卡境内，却恰好处在对土有重要意义的“巴库-第比利斯-杰伊汉”石油管道和“巴库-第比利斯-埃尔祖鲁姆”天然气管道的交汇处。土担忧7月冲突是亚美尼亚对土“断气”战略的预演。而支持阿塞拜疆收复纳卡，可大大消耗和牵制亚美尼亚，阻断其潜在威胁。

二是为转战叙利亚、利比亚内战的雇佣兵和“圣战分子”找下家。目前，有多个消息源证实，此次冲突中有土耳其扶植的叙利亚雇佣兵身穿阿塞拜疆军装作战。另据航班雷达App显示，土耳其空军的C-130E运输机频繁往返于的黎波里与巴库之间。

三是奠定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持久影响力。土介入亚阿争端，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帮阿塞拜疆收复失地，而更多是为了成为日后谈判桌上的一方，与俄、美、欧共同主导战后地区秩序。

在所有外部大国中，土耳其是唯一反对无条件停火，坚持以亚美尼亚撤出纳卡和全部阿被占领土为停火前提的。这等于是支持阿塞拜疆打到底。

第四、俄美欧伊等无暇顾及，为阿塞拜疆提供“机会窗口”。

在影响南高加索地区和纳卡问题的主要大国中，除土耳其外，俄、美、欧、伊朗等均无暇、无力、无意出面干预。

俄在7月冲突爆发后，未做出应有的快速反应。2016年4月亚阿“四日战争”爆发后，俄迅速召集了两国军事首长在莫斯科达成停火协议。但7月俄除呼吁双方停火外，对其传统盟友亚美尼亚未给予公开和实质的支持。虽然7月17日俄军在南部和西部军区举行军演，但俄国防部极力否认演习与亚阿冲突有关。这种对亚阿冲突相对消极，对亚美尼亚相对冷漠的姿态，都强化了阿塞拜疆实施进攻作战的决心。加上8月以来白俄罗斯政治风波牵扯了俄精力，进一步为阿扩大了机会窗口。

美国忙于大选和对华竞争，对南高加索事务的兴趣和关注已大幅下降。蓬佩奥对7月冲突仅发表了极为简短、不痛不痒的评论。欧盟在对土耳其和南高加索地区的政策上分歧较大，难以达成共识。伊朗则顾虑到本国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分离主义，不可能大规模援助亚美尼亚。

最后，7月冲突后，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，彼此极端仇视，两国民众不仅在互联网上互相攻讦，侨民和移民甚至在莫斯科、洛杉矶、布鲁塞尔等数十个“第三国”城市大打出手，酿成流血事件。严重的民族敌对情绪与政治因素相叠加，最终使战争不可避免。

二、冲突的特点与走向

第一，阿塞拜疆无人机作战令人瞩目。

由于纳卡多为险峻的山区，双方航空兵很难发挥效能，防空系统的部署也面临多重限制。因此，以火炮和轻步兵为主的地面作战是亚阿冲突的主要形式。此次冲突中，阿军无人机作战成为颠覆传统的“规则改变者”。

阿塞拜疆较早开始重视挖掘无人机作战潜力。2016年4月和2017年10月，阿军曾分别使用以色列制“哈洛普”（Harop）和“轨道飞行器-1K”（Orbiter-1K）自杀无人机（巡飞攻击系统）袭击亚军目标。在此次冲突中，这两种无人机因其操控模式灵活、雷达和红外特征极小、巡航时间长，成为阿军的重要作战手段。航班雷达App显示，以色列南部奥夫达（Ovda）空军基地频繁有阿军运输机起降，目的可能是为了补充无人机及其备件。

阿塞拜疆无人机作战也受到了土耳其的指导，甚至有人称是土军操作了部分作战。一个例子是，阿议会今年6月批准从土引进Bayraktar TB2中型远程作战无人机。但此次冲突中，该机作为空袭主力，已在阿塞拜疆国防部公布的多个“战果录像”里现身。用时3个月接收装备和形成战斗力，没有土方的大力协调甚至直接参与，是难以想象的。

相比之下，亚美尼亚军队对无人机战术缺乏针对性部署，常规防空手段难以有效摧毁自杀无人机。部队时常眼看后者俯冲摧毁友军而无计可施，不仅蒙受损失，也背负较大的恐惧与压力。

亚军主要的反制手段是轰炸无人机基地。10月4日，阿南部重镇甘贾遭到数枚来自亚境内的弹道导弹袭击，居民区起火。亚方则称此次攻击来自“阿尔察赫军队”，目标是阿军无人机主要驻地甘贾空军基地。

第二，冲突进入僵持阶段，政治博弈即将入场。

开战以来，亚阿两军均宣称自己是胜利者，双方在热战之余大打“心理战”“信息战”，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本方战果、敌军遗骸、平民伤亡等视频，且都有夸大战果之嫌。阿军虽凭借制空权优势，初期一度给亚军人员和装备以较大杀伤，但地面作战实际进展有限，且人员装备损失也在增加。双方开始使用短程弹道导弹打击对方弹药库，破坏补给线，标志着战局已进入僵持与消耗阶段。继续交战的军事意义有限，升级成两国间甚至地区性全面战争的风险却在增加。

另一方面，目前的局面下，亚阿两国都可暂时自称“胜利者”。亚美尼亚和纳卡顶住了全面进攻，但损失严重，迫切需要停火脱困；阿塞拜疆收复了若干地区，发泄和安抚了国内情绪，但继续进攻反而会增加内政风险。双方都找到了支持休战的“面子”，在此背景下，俄罗斯等外部大国选择入场调停。3-5日，美国国务院主管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·里克（Philip Reeker）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会晤。6日，土外长飞抵巴库。9日，普京表示，在帕西尼扬和阿利耶夫间已进行的一系列“电话会谈”基础上，邀请两国外长到莫斯科谈判。

三、余论

纳卡问题源于沙俄帝国崩溃，爆发于苏联解体。1994年后形成的脆弱停火局面，既反映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独立初期的国力对比，更是俄、美、土、欧、伊等主要地缘政治玩家利益博弈的结果。2020年7月以来的冲突升级，实际上宣告1994年格局寿终正寝。

第一，因国内政治与实力对比的变化，两国都已不满于1994年协议：

亚美尼亚不愿再坚持对纳卡的模糊定位，而阿塞拜疆志在收复纳卡及被占领土。双方条件难以调和，但又无法单靠军事手段完全压倒另一方。对现状的不满，与脆弱的国内政治生态和长期积累的民族仇恨相叠加，使双方重燃战火的可能性大增。纳卡大概率将从一座“休眠火山”变为周期性喷发的“间歇泉”，这无疑将对两国人民和整个地区造成灾难性后果。

第二，维系1994年格局的大国调停与威慑也已不复存在。今年，白俄罗斯、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乱局、纳卡冲突再起，都标志着俄罗斯主导的“后苏联空间”经历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最剧烈的震荡。俄维护和再造地区秩序的能力与意愿都在经受考验。陷入内部紊乱的美欧也难以继续在南高加索投入精力。土耳其作为除俄外最有实力和意愿的地区玩家，因完全站在阿塞拜疆一边，也无法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。

第三，新地区秩序的建构都将是长期工程。纳卡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难解的僵局之一，不仅有和平问题、领土问题、民族自决问题，也有被占领土定居点和难民问题，其复杂程度比巴勒斯坦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各域外大国不仅需要尊重纳卡亚美尼亚族的民族自决与安全，也需要尊重阿塞拜疆的领土与主权完整，尊重因战争而失去家园与生计的数十万阿族难民的权利，正视历史，面向未来。另一方面，亚阿两国恐怕需要至少一两代人的时间，才能重建信任，但至少应从现在做起，停止煽动种族仇恨和复仇，共同研究历史教训。

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

网址：sis.ruc.edu.cn

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

邮编：100872